

宋庆龄与世界反战运动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 朱玖琳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 20 辑，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 6 月版

内容提要：1930 年代初，在世界大战阴影笼罩之下，联共（布）、共产国际为防止各敌对国进攻苏联，同时也为了实现其在世界范围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世界革命目标，借助巴比塞、罗曼·罗兰等著名作家的影响力发起世界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运动，以 1920 年代成立的反帝大同盟为基础，成立了世界反战委员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逐渐从反一切帝国主义向反帝反法西斯过渡。在这一过程中，身为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世界反战委员会中国代表的宋庆龄，积极参与世界反战运动，争取世界进步力量支援中国抗日，并声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她公开出面筹办的远东反战会议是一次过渡性会议，体现了共产国际反战运动从反一切帝国主义逐渐向建立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过渡，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也是积极的。1930 年代后期，共产国际发起的世界反战运动最终被由英法人士发起的国际和平运动所取代，宋庆龄也成为国际和平运动的象征性领袖。

关键词：宋庆龄 共产国际 世界反战运动 世界反战委员会

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得到了苏联以平等待中国的承诺以及帮助，在致苏联遗书中，他高度评价苏联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并说“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¹

苏联被孙中山视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忠实追随于孙中山的宋庆龄“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自由、独立、民主、富强的真正的共和国。她视苏联为中国的的朋友，与共产国际驻华人员关系亲近。

1933 年 9 月 30 日，宋庆龄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代表的身份，公开领衔筹办远东反战会议。这次会议在上海成功秘密举行，它实际上由共产国际暗中领导，是世界反战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国际性反战大会，其规模虽然远不如第一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反战大会，但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其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是积极的。

一、涉足世界反帝运动

宋庆龄所参加的世界反战委员会诞生于 1930 年代，它与诞生于 1920 年代的共产国际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一脉相承，而宋庆龄本人也早在 1920 年代涉足反帝大同盟领导的反帝运动。

苏联 1920 年代支援孙中山的目的与共产国际初期对东方革命的总体构想有关。为了使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能在列强诸国的包围和进攻中生存下去，列宁借助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理论，提出以苏俄为中心发展和壮大世界社会主义势力，推翻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世界革命目标。在第二国际因为各国工人党支持自己的政府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瓦解后，列宁于 1919 年建立起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以进行其所主张的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革命。关于如何开展东方革命，1920 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列宁认为在殖民地运动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自身力量还很薄弱，所以应该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

¹ 《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641 页。

命运动合作，哪怕是暂时的合作，然后再逐步夺取领导权。”²据此，共产国际在对东方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策略指导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从前的反对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妥协策略，转变为主张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重点强调“反帝统一战线”策略。³于是，在苏联眼中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成为了苏联世界革命的联合对象。

在这一背景下，1925年中国五卅运动爆发后，由共产国际的国际工人救济总会（Workers' International Relief，该组织德文名 Internationale Arbeiterhilfe，简称 IAH，1921年成立，1935年解散）主席、德国共产党领袖维利·缪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在德国发动了“不干涉中国运动”（Hands Off China Campaign），8月16日，缪岑贝格在柏林召开不干涉中国运动的集会，有近千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两名中国学者。这两名中国学者向缪岑贝格建议，在布鲁塞尔或者哥本哈根召开一次实实在在的、有世界各方代表参加的反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会议。⁴缪岑贝格由此认识到不单单要关注中国，还要关注世界反帝运动。1925年叙利亚爆发了反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12月，缪岑贝格建立反叙利亚暴行委员会（the Committee Against Atrocities in Syria）。1926年2月10日，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和反叙利亚暴行委员会（the Committee Against Atrocities in Syria）在柏林召开联席会议，在缪岑贝格的倡议下，反殖民压迫大同盟（League Against Colonial Oppression）在柏林成立。柏林联席会议同意缪岑贝格的计划，决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一次反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国际性会议。⁵

缪岑贝格在柏林组织不干涉中国运动时，旅欧考察的邓演达正在柏林，他为争取海外声援中国，“在德国西部莱茵河旁边几个城市去演说，……又在柏林一个大会演说，十二分的受人欢迎优待”⁶。柏林联席会议之前，缪岑贝格致电已在国内参加国民党二大的邓演达说：“反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的行动委员会（即反殖民压迫大同盟——笔者注），定于本年夏季召集反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国际会议，届时务请广东各团体派员参加，盼电复。”邓演达接到电报后，随即向2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出“国际工人救济会召集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会议，函请广东各团体参加，应如何办理案”。他在提案中提议：“卫立（即维利·缪岑贝格——笔者注）同志系德国极热忱之烈[列]宁党徒，与本党表示十二分之同情，并努力帮助本党，似应参加与会。”会议决议：“准派员参加，并请邓演达同志以本党名义电复卫立同志及顾问开会日期。”⁷邓演达致电询问后，接到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章伯均及反殖民压迫大同盟和国际工人救济会来函，告知开会地点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期大约在7月间，但要等收到各国复电后再做确定。邓演达随即于4月13日列席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时，汇报了国民党驻德支部参加柏林建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活动，并提出“派员参加柏林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会议案”，要求具体落实派人参加会议之事。会议决定：“中央党部拟派胡汉民同志代表本党及国民政府出席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会议。但此事应交政治委员会复审为妥。如政治委员会决定派胡，则以熟悉德国情形之

² 李玉贞著：《马林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83页。

³ 详见姚金果、苏杭著：《读解中国大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4—5页。

⁴ RGASPI 538/2/27, 108_9, 18/8_1925, 转引自 Fredrik Petersson, *Hub of 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Berlin, 1927–1933*,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2014 Vol.16 No.1, p55.

⁵ RGASPI 542/1/4, 2_4, 10/2_1926, 转引自 Fredrik Petersson, *Hub of 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Berlin, 1927–1933*,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2014 Vol.16 No.1, p56; <http://www.open.ac.uk/researchprojects/makingbritain/content/league-against-imperialism>（英国开放大学 The Open University 网站）

⁶ 黄振位、梅日新、黄济福主编：《邓演达研究及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15页。

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页。

廖焕星同志副之，否则中央党部竟[径]派廖焕星同志代表本党就近出席。”⁸廖焕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时为国民党驻德支部成员，国民政府后指派廖一人与会。⁹

1927年，原定7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提前于2月举行。2月10至15日，在“反殖民压迫大同盟”的基础上，“反帝大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宋庆龄又称之为Anti-Imperialist League）在布鲁塞尔正式成立，全称为“世界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大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简称LAI）。¹⁰参加会议的各民族及各国团体代表共计有174人，“当时讨论之议题，注重政治方面，议决各民族互相联络，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之种种计划”。¹¹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反帝大同盟的成立宗旨“在于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统一的支持立场，以对抗国际联盟对殖民主义的维持现状政策，计划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使用印度士兵保护英国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利益之类的帝国主义行动上。”¹²

布鲁塞尔会议选举巴比塞（Henri Barbusse）、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宋庆龄和Lu Chung Lin（似为鹿钟麟，时鹿正奉冯玉祥之命在苏联谋取援助）组成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团，英国工党领袖George Lansbury、荷兰工团主义者Edo Fimmen、印度国大党代表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中国国民党代表廖焕星、塞内加尔的Lamine Senghor、缪岑贝格、波多黎各的Manuel Ugarte、印度尼西亚的Mohammad Hatta、非洲的Josiah T. Gumede和Jimmy La Guma、安的列斯群岛的Max Bloncourt、世界黑人进步协会代表Richard B. Moore、全美反帝同盟代表Manuel Gomez、美国民权同盟代表Roger Baldwin，被推选为执行理事会成员。¹³执行理事会理事长是英国工党领袖George Lansbury，副理事长是荷兰工团主义者Edo Fimmen，而它的执行书记则由两名共产党员担任，一人即缪岑贝格，另一人是加入德国共产党的印度人恰托（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¹⁴。

12月10日，反帝大同盟执行理事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专门讨论其内部组织问题，结果新设民族部、国际部等，使内部组织更加完备”。¹⁵大会召开之日，已因国共分裂而出走苏联的宋庆龄在莫斯科致电布鲁塞尔反帝大同盟执行理事会，对因故未能参加会议表示十分遗憾，并强烈呼吁会议支持中国革命。该电全文译文如下：

反帝大同盟

布鲁塞尔

万分抱歉因形势所碍不能与会，强烈呼吁大会加强对中国在英日帝国主义的帮助和怂恿下的白色恐怖和军事独裁政权作斗争。中国革命工农的英勇斗争值得全世界受压迫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积极援助，因为中国革命是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堡垒的关键，所以全世界受压迫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投到中国革命上来，视中国的革命斗争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尽一切可能来保卫中国的革命斗争。

大会应该立即采取的的第一个最实际的步骤是将世界人民组织起来，呼吁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和炮舰。没有这些军队和炮舰做依靠，反动政府会很容易就被中国人民推

⁸ 同上，第525、527—528页。

⁹ 《申报》1926年8月1日。

¹⁰ Fredrik Petersson, *Hub of 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Berlin, 1927-1933*,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2014 Vol.16 No.1, p50.

¹¹ 《申报》1929年6月22日。

¹² [美]简·麦金农、斯·麦金农著，江枫、郑德鑫译：《史沫特莱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62页。

¹³ Fredrik Petersson, *Hub of 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Berlin, 1927-1933*,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2014 Vol.16 No.1, pp51-52.

¹⁴ 参见荷兰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反帝大同盟档案”（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rchives）藏档说明，<http://www.iisg.nl/archives/en/files/1/ARCH00804.php>。

¹⁵ 《申报》1929年6月22日。

翻掉；第二步是要求废除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夺了中国的财政大权，从而使中国还不如殖民地国家；第三步是撕去中国反动政府标榜革命从而误导其他国家人民的假面具，向全世界揭露中国反动政府的血腥暴行和帝国主义走狗的本质。

宋庆龄

1927年12月10日¹⁶

二、在“左”倾化的国际反帝运动中

宋庆龄出走苏联不久，即在莫斯科与陈友仁和邓演达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领导机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们发表宣言，准备“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¹⁷是时，苏联党内正在为追究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而互相指责。众所周知，斯大林以他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将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塑成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先知先觉”。按照这个“三阶段论”，中国革命在经历了以反帝为主的全民族联合战线的第一阶段之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相继背叛革命，因此，中国革命必须进入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于是，就连国民党左派也被视为革命的斗争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到苏联不久就遭遇到反对之声。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时，有些激烈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主张不够彻底，她当场予以驳斥，并嘲讽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¹⁸

尽管如此，苏联和共产国际仍旧十分看重宋庆龄的作用。一方面，因为宋庆龄的身份特殊，她可以起到一般人起不到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十分清楚宋庆龄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立场，相信她会与他们合作。还在武汉政府时期，宋庆龄的姐姐蔼龄、弟弟子文以及她的一些朋友们都努力要把她从武汉带走，但是宋庆龄一方面不愿意丢下伤兵救护会工作置北伐伤兵们于不顾，另一方面她告诉他们：“我绝不会与蒋介石讲和。”¹⁹她在汉口会见来访的美国合众社记者兰德尔·古尔德时说：“中国的革命必须进行下去。”²⁰

1928年3月22日，斯大林主持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让宋庆龄去美国一至两个月作关于中国和苏联的报告和演讲是合适的。如果宋庆龄愿意让柳克斯同志陪同去美国的话，不反对他去。建议宋庆龄希望会见的那些同志不要拒绝会见她。”²¹

次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在莫斯科致函加拉罕，转告远东书记处关于宋庆龄问题的建议。其中关于吸收宋庆龄参加社会活动方面工作的计划是“制定在中国成立反帝同盟的计划，由她主动参加该同盟的工作，并保证可以利用这个广泛的组织作为共产党人进行工作的某种合法掩护。”²²

宋庆龄后来并没有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计划去美国，而是于1928年5月去了反帝大同盟的本部柏林。当时邓演达正在柏林筹组第三党，他于1928年2月22日致函宋庆

¹⁶ 笔者译，该电英文原件藏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国内几乎所有宋庆龄传记及相关文章均因该电而误以1927年12月10日为反帝大同盟的正式成立日，并误以为宋庆龄是创始人之一，其实是将反帝大同盟执行理事会会议误会为成立大会了。

¹⁷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208页。

¹⁸ 屈武：《操比金石 节砺冰雪——回忆宋庆龄同志》，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¹⁹ Milly Bennett, *ON HER OWN: Journalistic Adventur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27*, 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

²⁰ Randall Gould, *Mme. Sun Yat-sen Interviewed at Hankow,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n 11, 1927.

²¹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384—385页。

²² 同上，第389页。

龄，希望宋来柏林共同商议。²³宋初到柏林时，反帝大同盟执行理事会中唯一的一名中国成员廖焕星与她接触频繁，廖此时是作为中共党员旅欧支部成员驻在柏林，结果他涉嫌第三党而遭遇到麻烦。²⁴

1928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继续斯大林的极左政策，主张实行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并提出“三阶段”理论（又称“第三时期”理论），形成了更为系统的“左”倾政策。

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报告中，布哈林批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向右”转，并说中国在“愚蠢之极”的右倾时期以后，“又出现了‘左’倾。目前‘左’倾具有盲动情绪、盲动策略等形式。但是，一般说来，现在脱离正确路线的倾向是右比‘左’更甚”。²⁵

在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中，布哈林说：国际工人运动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直接革命行动底阶段”，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渐次的有了部分的稳定”时的防御阶段，第三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危机尖锐化时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资产阶级彻底毁灭的阶段。并说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必然会发生“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伟大的阶级斗争”，“这个阶段必不可免的要加紧资本主义稳定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继续发展必要使资本主义的稳定动摇，要使资本主义之一般的危机更特别尖利化”。²⁶

共产国际六大据此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提出：“制止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反对干涉和瓜分中国，保卫中国革命和殖民地起义——这就是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²⁷大会另外还通过了《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措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等提纲和《开展国际反战运动的决议》，提出了“用战争对付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等口号，要求各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大会、上街示威游行、抗议罢工等。²⁸

在六大讨论布哈林报告时，中共党员陈宽（译音）表态他完全同意布哈林的报告，并指责廖岑贝格主编的《工人画报》为国民党捧场，因为杂志封面印了“‘第三党’头面人物之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肖像”，“在照片的背面题有引自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语录，而孙中山的学说是反对阶级斗争的，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陈循着“第三时期”理论的思路说：“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是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早已不是遵循孙中山精神，而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断得到发展的。恪守孙中山精神的继承者们，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这些人恰恰相反，他们应该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过程中的失败者。”廖岑贝格对此指责的回应很是苍白，他承认这是一个政治错误，并辩解说这一错误是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产生的，他已经做了更正。²⁹

反帝大同盟的创办经费由共产国际提供，“后来共产国际有意识地不对这个组织实行直接控制，以避免它被说成是莫斯科操纵的”。³⁰反帝大同盟成立初期有很多遭受殖民压迫、反对殖民统治的非共产主义成员参加，中国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便派有人参加，蒋介石也曾在

²³ 见邓演达1928年2月22日致宋庆龄函，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页。

²⁴ 详见李玉贞：《宋庆龄与第三党》，《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97页。

²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52、256页。

²⁶ 同上，第435—436页。

²⁷ 同上，第447—448页。

²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598页。

²⁹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286页。

³⁰ [美]简·麦金农、斯·麦金农著，江枫、郑德鑫译：《史沫特莱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62—163页。

1927年2月13日从广州致电大会称：“闻贵会已正式开幕，予谨以满腔热忱致电。”³¹但是，共产国际六大后，共产国际重又直接插手反帝大同盟，原先的“统一战线”路线被“阶级斗争”路线所替代，因而遭到许多非共产主义成员的反对，结果1929年英国独立工党的James Maxton被除名，随后绝大多数非共产主义成员亦被开除或自动退出。³²

反帝大同盟的这一变化对宋庆龄而言似乎影响不大，也许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或者她并不反对。1929年她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后在上海休息期间，在是年8月1日（共产国际确定的第一个国际反战日）致电反帝大同盟，强烈谴责南京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指责国民党领导人“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³³

究其原因，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宋庆龄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对宋庆龄做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8年3月22日会议所计划的“更有力的系统工作”。宋庆龄在德国期间，“有一位德俄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罗比列（Fride Rubinet）‘受驻柏林苏联使馆之命’与之‘往返’，此人在德共中央做宣传、教育及报告等工作。”³⁴与共产党人频繁接触的结果是宋庆龄最终动摇了对第三党的信心，1928年8月她犹豫地表示“可能共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³⁵1929年在国内时，她拒绝会见包括第三党人在内的任何人。³⁶1931年回国后，她公开表示自己不是第三党员。³⁷

三、向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过渡

宋庆龄回国后不久国内即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随后又进一步攻击上海。其时，世界经济危机恶化国际关系、引发政治危机，苏联认为资本主义在总危机之下将通过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问题。继续着共产国际六大的基调，1931年3至4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称：“对苏联实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已经成为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直接危险。”³⁸为了使中国“不变成再次攻击苏联的一个部分和进攻基地”，³⁹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组织由著名作家和学者签名的呼吁书。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停止对中国的掠夺战争”，“要利用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一切愤怒情绪，掀起对日本的敌对情绪。”⁴⁰

一方面，苏联公开向日本保证不介入中日问题；另一方面，他们暗中通过共产国际外围组织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尤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运动。于是，在缪岑贝格的暗中组织下，1932年6、7、8月间，法国两大文豪巴比塞和罗曼·罗兰连续发

³¹ 《申报》1927年3月6日。

³² 参见 Fredrik Petersson, *Hub of 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Berlin, 1927-1933*,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2014 Vol.16 No.1, p58-59; 荷兰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反帝大同盟档案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rchives) 藏档说明, <http://www.iisg.nl/archives/en/files/1/ARCH00804.php>。

³³ 兰德尔·古尔德 Randall Gould: 《孙逸仙夫人坚持信仰》 *Madame Sun Yet-sen Keeps Faith*, 载《民族报》*The Nation* 1930年1月22日, 转引自《文献》1981年第10期。

³⁴ 李玉贞: 《宋庆龄与第三党》,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第95—96页。

³⁵ 宋庆龄1928年8月致杨杏佛函,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 《啼痕——杨杏佛遗迹录》,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第208页。

³⁶ 详见拙文《大革命失败后的宋庆龄与邓演达》,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1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第148页。

³⁷ 《宋庆龄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82页。

³⁸ [匈]贝拉·库恩编,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3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 第266页。

³⁹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黄修荣主编: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第59页。

⁴⁰ 同上, 第111页。

出对世界民众的号召，提议组织世界反战运动。欧、亚、非、美各州随即成立了许多反战运动发起委员会。在此期间，纳粹党在德国崛起，成为德国国会最大党，这使得苏联感觉自己腹背受敌。1932年8月27日至29日，以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名义召集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World Congress Against Imperialist War）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35国代表近2000人出席，宋庆龄因忙于牛兰案未与会，但她仍与爱因斯坦、萧伯纳、高尔基等同任大会执行委员。大会发表宣言，指出“在目前之政治状态下，任何帝国主义战争，结果必牵动全世界”，尤其日本之侵入中国“会引发诸大强国之间未来非常惨酷的争夺”。宣言表示“反对对于苏联作恶意的和造谣的宣传”，“反对瓜分中国”。大会于31日举行闭幕式，并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World Committee against Imperialist War，简称世界反战委员会），宋庆龄作为中国代表名列委员会。缪岑贝格竭力避免将俄国人牵扯入内，反战委员会中只有高尔基是俄国人。⁴¹

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听取了缪岑贝格关于向满洲派特别委员会和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的信，决定总体上采纳缪岑贝格的意见，并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战委员会具体拟订计划。⁴²

按照共产国际11月10日会议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战委员会负责人贝拉·库恩拟订了具体计划，主要内容是：1）远东反战会议将在上海以国际会议的形式召开；2）召开会议的动议将由世界反战委员会巴黎会议以发号召书的方式公开提出；3）宋庆龄领导上海筹备委员会；4）会议的主题是中日冲突；5）派往满洲的调查团由欧美著名作家组成；6）参加会议者的成分如阿姆斯特丹会议一样；7）会议的性质应该是非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活动；8）会议经费开支应靠募集当地的资金来解决，共产国际只对调查团和欧洲其他必要的代表团给予资助。⁴³

1932年1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听取了贝拉·库恩关于远东反战大会指示的建议，决定“中国、日本、朝鲜和满洲的代表应该参加上海的大会”。⁴⁴

贯彻贝拉·库恩拟订的计划，12月21—23日，世界反战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宋庆龄原本也是打算出席的，所以她向共产国际驻华的国际联络部人员提出请求，希望允许她在赴欧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以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对此决定“满足请求”。⁴⁵不过在上海忙于营救牛兰夫妇及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⁴⁶的宋庆龄终究未能成行。巴黎会议决定：1）以反帝大同盟的名义，派遣由欧美各分部委员会代表所组成的调查团到远东去；2）准备在远东、南美、巴尔干、斯堪的纳维亚等各地分别举行反战大会；3）反战大会在远东的上海应首先举行；4）在上海的大会中举行世界反战委员会第三届常务会议。⁴⁷

1933年1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并同时抄送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告知他们：1）将派调查团赴满洲和华北调查日本的作战行动；

⁴¹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Committee_Against_War_and_Fascism#CITEREFLewy1990；万里宾著：《世界反战运动》，1933年11月11日刊印，第5—7、37—48页；《申报》1932年8月29日、9月1日、9月2日。

⁴²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27页。

⁴³ 同上，第230—232页。

⁴⁴ 同上，第229—230页。

⁴⁵ 同上，第221页。

⁴⁶ 同上，第345页。

⁴⁷ 《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对中日朝鲜人民宣言》，《国际每日文选》第57号，1933年9月26日，第2—7页。

2) 打算在上海召开合法的反战大会; 3) 最好吸收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真正的民族革命人士参加, 条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领导。并正式通知他们: 在中国的反战大会筹委会领导人是宋庆龄。⁴⁸

共产国际为了召开合法化的远东反战会议而要求吸纳国民党成员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但同时又要求反对国民党领导, 这一相互矛盾的指示完全不切实际。

1933年2月7日, 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皮亚特尼茨基报告说: “我们已着手筹备在上海召开反帝代表大会。在北平也将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将尽量尝试半合法地举行这次会议。”虽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已开始着手筹备, 但埃韦特仍然建议让反帝大同盟的合法组织者缪岑贝格、巴比塞、宋庆龄等人来进行上海反帝大会的筹备工作。从以后的实际发展来看, 埃韦特的这一建议并未获准, 筹备工作依然是在公开和半公开的状态下, 由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

1933年7、8月间, 国际代表即将来沪前夕, 中共上海中央局或者是中共江苏省委向参与宣传鼓动工作的全体党员发出了《欢迎国际反战代表团宣传提纲》, 要求依照下列的提纲, 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 1) 说明资本主义危机之尖锐化与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之迫切。
- 2) 指出国际反帝反战运动的高涨。
- 3) 加重的指出国民党的罪恶与中国民众的出路——只有武装起来广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

为指导党员的宣传鼓动工作, 这一文件就各条纲要作了详细说明, 其宣传重点是: 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在积极准备武装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 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中国民众的唯一出路是全体武装起来, 在苏维埃红军领导之下进行打倒国民党与一切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民族战争。⁴⁹

这一宣传提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斗争是将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并举, 认为一切军阀都是投靠帝国主义的, 主张直接发动人民抗战, 借助民族战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将抗日与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并举, 认为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一样具有瓜分中国的野心, 帝国主义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攻苏联, 主张反对英、法、美、日等一切帝国主义国家, 保卫苏联。

但是, 继1932年8月阿姆斯特丹的世界反战大会之后, 国际形势迅速变化,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 法西斯主义开始盛行。虽然阿姆斯特丹会议也提出反法西斯斗争, 但是它的重点是反英、法、美、德、意、日等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抬头, 共产国际开始在欧洲重点组织反法西斯主义运动。1933年6月, 巴黎举行反法西斯会议, 包括反帝大同盟在内的各组织与会代表达3000余人, 主席团人选中有因所谓“国会纵火案”而在押的德共领袖台尔曼、托尔格列尔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等, 会上成立了欧洲反法西斯主义中央委员会。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以世界反战委员会名义向大会申请, 在“保证无产阶级胜利之群众斗争之联合战线”的口号下, 将反法西斯斗争及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联合起来。⁵⁰8月20日, 欧洲反法西斯主义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与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执行局在巴黎举行联席会议, 决定将反帝国主义战争运动和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合并, 两委员会亦合并为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 (World Committe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⁵¹

两种运动的合并是远东反战会议从最初的反帝战会议转变为反战反法西斯会议的根本

⁴⁸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 第295页。

⁴⁹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 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11月版, 第108—112页。

⁵⁰ 《申报》1933年6月7日。

⁵¹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Committee_Against_War_and_Fascism; 万里宾著: 《世界反战运动》, 第9—10、16页。

原因。8月21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各级党部关于筹备世界反帝非战大会的紧急通知，明确说明：“这次反帝大会定名为反法西斯蒂非战大会，各地党部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反对法西斯主义紧密的联系起来。”在此之后，出现了“远东反战反法西斯蒂代表大会”、“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等名称，不过这只是表述略有不同而已，性质是一样的。

1933年1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关于上海反战大会成果和评价的决议》指出：上海会议“开展了广泛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不仅包括工人阶级的进步阶层，而且也包括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特别是在上海，渗透到一系列企业中，这以前我们的运动完全没有在这里出现过，或者很少出现；吸引和动员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士，以前他们与反战运动没有任何关系。”⁵²对国际代表团的组成，与埃韦特所谓“代表团糟糕的人员组成简直不可想象”⁵³的评价不同，决议要求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共产党党团应该“仔细研究代表团的报告”，“应该保证散发报告，特别是在日本”，除报告外，还必须“尽快发表”法国代表瓦扬-古久里和英国代表汉密尔顿的报告。⁵⁴

远东反战会议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反战运动从反一切帝国主义战争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过渡的会议，会议所取得的宣传效果为中国以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几乎与之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王明和康生于1933年10月27日将其所草拟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要求建立下层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一纲领于次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得以公开发表，并获得广泛支持。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奠定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也开始转向建立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推动国共建立第二次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随着法西斯势力逐渐崛起，宋庆龄在向世界呼吁援助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向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反法西斯力量提供声援。不久，共产国际发起的世界反战运动逐渐被迅速席卷欧美各国的国际和平运动（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中国称之为“国际反侵略运动”）所取代。国际和平运动由英国国联协会会长薛西尔（Robert Cecil）爵士和法国前航空部长高特（Pierre Cot）发起，1936年9月3日至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有35个国家的4000余位代表和800余位来宾出席了会议。⁵⁵中国经济学家、中共地下党员钱俊瑞代表宋庆龄参加了这次会议。随后，他又于9月10日赴巴黎代表宋庆龄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罗曼·罗兰形容宋庆龄不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头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⁵⁶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推宋庆龄等为赴英代表团参加即将在伦敦举行的大会。⁵⁷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于1938年2月12至13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以援华制日为主题，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以宋庆龄代表的名义与会，并任大会名誉主席，位居主席台。⁵⁸宋庆龄向大会致电，呼吁与会诸君“发动广大群众，利用舆论力量，以促使各国政府及民众，摈弃侵略者，则各友邦之集体行动，定能制止日本屠杀中国民众，破坏中国固有文明，不然，诸君坐视漠睹，听其逞凶，则祸延自身，定将悔之莫及。”⁵⁹

结 语

⁵²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19—620页。

⁵³ 同上，第526页。

⁵⁴ 同上，第622页。

⁵⁵ 沈庆林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⁵⁶ 钱俊瑞：《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1日。

⁵⁷ 《申报》汉口版，1938年1月24日。

⁵⁸ 《良友》1939年第144期，第14页。

⁵⁹ 《国际反侵略运动：伦敦大会各国代表演讲实录》，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印行，1938年9月版，第60页。

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实现建立世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政治目标,也出于维护自身生存和外交利益的目的,建立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发起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出于对孙中山临终遗愿的忠诚,也出于谋求在中国实现建立自由、独立、民主、富强的真正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竭力争取下,宋庆龄积极地投入到共产国际领导的世界反战运动中。

在列宁时代所奠定的反帝统一战线政策下,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成为共产国际世界反帝运动的象征性领袖。

在斯大林时期实行极“左”政策时,资产阶级阵营的宋庆龄成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积极争取的对象,希望通过她为苏联在世界反帝运动中树立正面形象,而她也在共产国际反帝运动的支持中,不断呼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继续下去。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宋庆龄通过筹办远东反战会议,为中国以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她一直在呼吁世界各国支援中国抗日,不要忘记远东的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屏障,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到大量的世界舆论和物质支持。

在世界反战运动被国际和平运动取代之后,曾经是反战运动象征性领袖的宋庆龄依然是国际和平运动的象征性领袖。